

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 演进研究（1900—1911）

QINGMO JINGJIN GONGGONG WEISHENG JIZHI
YANJIN YANJIU

路彩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 演进研究（1900—1911）

QINGMO JINGJIN GONGGONG WEISHENG JIZHI
YANJIN YANJIU

路彩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路彩霞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16-06669-3

- I. 清…
- II. 路…
- III. 公共卫生—卫生管理—研究—中国—1900~1911
- IV. R19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362 号

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 路彩霞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300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6669-3	定价:3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读者看到的这部书，是路彩霞博士经过修改后的学位论文。该书出版之前，彩霞索序于我，作为了解她治学的导师，也想向读者谈些对本书的看法，以此作为推荐。

十年前，路彩霞考入南开大学读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当时疾病医疗社会史属于受到重视的新学术领域，鉴于学者关注江南较多，她将视野投向华北。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瘟疫与清代直隶社会》，广泛搜集了清代直隶地区地方志中记载灾疫、风俗以及人物部分中的有关资料，特别是使用了记载晚清瘟疫的资料丁国瑞《竹园丛话》，从社会透视瘟疫，分析瘟疫与官府应对、瘟疫与社会整合以及瘟疫俗信等问题，论述是比较新颖的。

继续读博，路彩霞将研究空间缩小到京津地区，时间放到了晚清。这一选择与她阅读《竹园丛话》有关，丁国瑞（字子良，号竹园）清代医家，报人，其文集《竹园丛话》收录有关京津医药卫生方面的大量资料。根据该书的提示，清末京津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值得研究。毗邻的北京、天津两大城市，前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者为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商埠之一，在晚清大变动时代中，京津地区的变化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缩影。公共卫生，这一现代文明强调的事物，出现于京津地区的历史舞台。路彩霞研究清末十年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她以“公共卫生机制”为问题意识，从地域入手，关注社会的近代转型，把握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勤奋治学，终于完成学位论文。

该书三编九章，分别探讨医药、卫生行政、防疫诸问题，我认为具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擅于捕捉社会新闻，发现重要问题。晚清报纸大量出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极好资料，作者阅读晚清十年的报刊等资料，注意到有关疾病医疗与公共卫生的报道较多，从社会新闻中捕捉重要信息。她考察了清末京津中医形象变化，发现在西医冲击、媒体宣扬、中医自责之下，庸医问题的被严重夸大。指出时人对庸医现象的认识过程，经历了由批判庸医个体到抨击中医全体，并由对中医的不信任逐渐演化为质疑中医学本身。为缓解庸医问题，京津地方政府及社会采取了考试医生、组织医学研究团体、兴办医学堂等一系列举措，京津医生专业化起步，制药售药也在规范化，折射出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

作者注意到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就中医存废问题第一次大论争加以考察。指出以西路医药研究会为组织的天津中医界和以新学派自居的《大公报》双方的冲突事件，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七日，导火线是《大公报》在本埠新闻栏内刊载中医路某误治事件并以评论形式涉及中医界。双方多次往来的函件，刊登于《大公报》、《正宗爱国报》与《醒华日报》上。笔战过程为京津中西医界公同关注，其核心是中医通过辩诬，试图争取在社会、学界以及人们心目中维持原有地位。《大公报》一方希望用事实说话，以激将法让中医赴重疫区东三省，来验证其能治鼠疫是否空谈，于是演变出《大公报》主笔英敛之与天津中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国瑞的打赌事件，后来被和事人居间调停而偃旗息鼓。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的笔战实际是民国时期中西医大论争的序曲，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讨论仍在继续。

二、重视考察制度建设，弄清演进机制。作者将公共卫生行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关心制度建设，探讨了清末中国管理卫生防疫事务的第一个专门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区域性防疫机构的天津卫生局。宣统二年，随着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将卫生管理纳入巡警行政，作者从天津临时政府卫生局、天津卫生总局、巡警局与卫生局的协作探讨了庚子至宣统间天津城的卫生管理，又从事权问题、经费问题、宣统防疫、民国初年的防疫处分析了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认为该事件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对我们今天的卫生事业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作者考证谨严、分析细致，揭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论述清晰，很有逻辑性。并能够小中见大，再现了中国近代化的蹒跚步履。她还考证北京外城卫生局，并就京津卫生行政模式检讨，相信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启示。

三、深入挖掘卫生民俗，呈现民众心态。反映民众对于事物看法的心态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其研究路数往往从民俗入手，透过表象，深入本质，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畴，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史。作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十分注意公共卫生与民俗的关联。防疫是公共卫生的重要方面，也是民间根深蒂固的观念与习俗，该书考察了致疫防疫理念的碰撞与调和，防疫行为、观念的冲突与调适、卫生与防疫的关系。年中度岁是夏秋间瘟疫流行时，通过举行过年仪式以禳除瘟疫的一种民俗行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霍乱大流行期间，南北各地普遍采取年中度岁避疫，作者从民俗现象和防疫事件双重角度对此考察，阐释清末民间俗信的存在状态以及作为防疫措施的民俗仪式在卫生方面的意义。作者对于宣统年间京津对于鼠疫的防疫实践，也值得注意。

病从口入，饮食防疫必不可少。本书对于肉食卫生与晚清防疫的论述，也有独到之处。已往研究多着眼于古代饮食文化和近代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作者则以肉类饮食习俗为切入点，具体考察时人的饮食卫生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防疫观念。这种对时人的心态与观念的考察，体现出一种新的治学理念。作者认为防疫体现

出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行政理念一定程度上的近代转型。

综上所述，路彩霞的研究从制度、人、观念等多个层次，将制度、社会与文化分析有机结合，呈现出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的演进情况，多有新意。本书的创造性体现出打破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界限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上，使我们从一个地域公共卫生机制的变化，看到晚清中国社会的变迁，寻找到现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起点。

路彩霞的博士论文，得到了清代医疗社会史与天津近代史专家的认可与好评，令我感到欣慰。她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到武汉从事博士后研究，探讨清末民国汉口卫生管理问题，努力挖掘报纸与档案资料，再现那时汉口卫生管理的基本面貌，揭示公共卫生政治意义的演变与多重属性。

期待着彩霞的新著别开生面。

常建华

2010年8月19日写就，29日订正于津门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上编 医药	15
第一章 清末京津中医形象变化	16
第一节 清末理想的医生形象	16
第二节 作为认识现象的庸医问题	24
第三节 晚清庸医现象的政治寓意	33
附录	36
第二章 京津医生专业化起步	51
第一节 解决庸医问题的官方举措	51
第二节 改良中医学的社会努力	60
第三章 制药售药的规范化	68
第一节 清末京津成药畅销情况	68
第二节 制药售药专业化	70
第三节 社会改良药学的努力	77
本编结语	86
中编 卫生行政	87
第四章 专业卫生机构的存废：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探析	88
第一节 清末天津城的卫生管理机构	88
第二节 天津卫生局裁撤之争	93

第三节 余论·····	104
第五章 巡警体制下卫生专业化的尝试：北京外城卫生局考·····	107
第一节 制度与实践：清末北京卫生机构演变概况·····	108
第二节 卫生专业化的尝试：外城卫生局考察·····	110
第六章 京津卫生行政之检讨·····	123
第一节 卫生警察专业化的努力·····	123
第二节 从协作到隔阂：卫生自治与巡警行政·····	127
第三节 卫生行政之检讨·····	134
本编结语·····	138
下编 防疫·····	139
第七章 致疫防疫理念的碰撞与调合·····	140
第一节 不干净的空气·····	140
第二节 想象中的虫子·····	145
第三节 消弭疫原方式的碰撞·····	152
第四节 余论·····	157
附录·····	160
第八章 防疫中的冲突与调适 ——以宣统防疫为主的考察·····	169
第一节 防疫行政理念冲突与近代伦理转型·····	169
第二节 宣统防疫中的协商和冲突·····	179
第九章 在卫生与防疫之间：晚清京津饮食管理·····	194
第一节 食用不良肉类的习俗·····	194
第二节 医理解释的混乱·····	197
第三节 卫生启蒙中的互动·····	202
第四节 食品行政的雏形·····	207
本编结语·····	215
结语·····	216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40

绪 论

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是清末中国走向近代的表征之一，广义的公共卫生行政包括医药行政、卫生（清洁）行政、防疫行政三方面。卫生管理有不同模式，公共卫生行政近代演进过程伴随着各种力量和关系的碰撞、冲突与调适。本书对此做了梳理和对照，以展示公共卫生机制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并阐发这一历程带来的公共卫生行政专业化、制度化、合理化启示。通过对公共卫生行政创建、卫生意识开启及防疫冲突背后伦理转型的考察，笔者拟重新界定“清末”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并在区域视野下对近代化道路选择问题进行反思。

一 研究对象

（一）时间断限

时人憧憬着 20 世纪将是中国步入文明之境的过渡时代，该提法始自梁启超：“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① 这里的举措是指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所颁布的实行新政的一系列上谕。清廷态度的变化给维新者重新带来希望，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②

“文野过渡之时，群演愈深，物竞愈烈”^③，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饱经沧桑的国人心态逐渐扭转，“人有恒言曰远东病夫，曰老大帝国，曰半开社会，曰退化人群，其称于世界尚矣，则我亦曷敢自中，则我又恶能自华？”^④ 原有的一切多被定性为旧的、落后的，“在维新者之目中，觉吾国之俗无一不陋，无一不宜痛改”。^⑤ 新旧对比中，膜拜西方文明的现象出现：“我国近来忽又添上一种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5 页。

②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梁启超全集》第 1 册，第 72 页。此文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从近代化的器物层面讲，自开埠之后京津社会即处于过渡状态，不过取法外国进行制度变革合法化却是在新政时，梁启超的百年过渡规划也由此正式开始。

③ 《论强国强种当以注意卫生为要》，（北京）《北京日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论说”。

④ 《中华报发刊词》，（北京）《中华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论说”。

⑤ 《工巡禁令亦成具文》，《中华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中央新闻”。

新迷信，凡是外国人所说所办的，全要奉若神明了。”^① 咸与维新的结果是，“方今人物抑中扬西，方今政治弃中效西，观众事忽中忽西，改头换面，亦中亦西，实无资格，实难乎人种而不中不西”。^② 不过，对迷信新学的反思也在进行：“新的有若疯狂，旧的如同聋瞽，要寻几位知机的君子，只恐十无二三。”^③ 保守与西化两种极端在冲突中调适，西方制度文明在本土化过程中走向近代。

清末在政治及思想领域出现的急进现象源于求治心切，同时也在于对近代化的复杂性、艰难性估计不足。“当今之时，文明竞进，如自迓者以行远，既行远矣，而我前途又无限也，且更有先我而疾驰者，欲不弃其故步可乎？”^④ 乐观的新学派欲奋起直追，旧力量的阻碍也激发了他们迅速占领阵地的决心，“夫今日过渡时代，新者半焉旧者半焉，故于改革之事，主张者半焉阻挠者半焉，迟迟而不决则阻挠者之势力必膨胀而无垠，而主张者之势力将不敌”。^⑤ 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使得先觉者对西方文化尚未认真咀嚼，就将之与中国社会匆忙结合，以致新政诸多举措形式维新，内容仍旧。

过渡时代的近代转型不是西方入侵带来的偶然现象，中国内部有其发展的脉络，专注地方司法与赋税的传统行政方式本身在城市日常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另外，晚清地方与中央离心力加强，新政的开展使人们对清廷怀抱希望：“中国值过渡时代之危险，危崖鲁石，巨浸汪洋，欲渡无楫，漂流徜徉。既有楫兮，无人主张，过渡时代须集权于中央。”^⑥ 在强权竞胜的时代，统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清廷也在努力加强对社会和地方控制，但扭转乏力。虽然最终新政作为一场由清廷主持的改革，随着一个朝代的覆亡结束了，卫生领域的转型虽没有改革之名，改革的成效却已深入。

1900至1911年间是过渡时代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公共卫生行政的建制时期。庚子之役是京津传统卫生管理方式与近代公共卫生行政的分界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卫生机构在天津创建，两年半后，欧洲的卫生管理经验为直隶政府承袭。北京在庚子后经历了军事化管理和安民公所的市政自治实践，其卫生管理经过一番曲折最终走上巡警行政道路。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政部划一全国警政，卫生管理依附于巡警体系，形式另类的天津卫生局遭遇了裁并之议，背后是近代化不同路径的冲突。医界竞

① 公仆：《新迷信》，《竹园丛话》第14集，“演说”，第40页；原文载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民与报》。

② 《维新政治之现象》，（北京）《庄言旬报》第19册，第1页。

③ 多话人：《折衷》，（北京）《正宗爱国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演说”。

④ 《论进步宜自速求》，（北京）《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论说”。

⑤ 《论改革宜速不宜迟》，（北京）《华字汇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论说”。

⑥ 愤时子：《过渡时代》，《庄言旬报》，第14页。

争激化,天津出现了中西医第一次公开论争,成为社会变迁潮流偏转的表征。宣统鼠疫有可能发展为全国性浩劫,地方防疫应时转变为国家防疫,防疫行政的原则也由仁政演化为社会理性。

对京津公共卫生管理机制的变迁而言,1900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然其近代转型并不终于1911年,民国承袭了清末确立的卫生行政方式。另外,孙燕京以嘉道以迄辛亥革命界定“晚清”时,曾解释说:“风尚的变迁其起甚微,其变亦缓,只有到了政治风云跌宕之时,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改变”,^①不仅卫生制度受政权更迭的冲击不大,卫生观念较之风俗变动更为缓慢,本文个别章节的叙述有时难以戛然而止正是这个原因。

(二) 地域限定

姜涛在《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指出,“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②近代公共卫生史、医疗社会文化史进入研究者视野未久,本书的清末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将在地域视野下展开。

不过,时人对南清、北清,南省、北省的划分不只是地域上的界定,二者的文化差异也很明显。清末上海是公认的高度西化的城市^③,相对于紧追西方文明步伐的上海,20世纪初的京津是“沉晦日久”的北清和^④风气半开未开的内地^⑤,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保守性。^⑥研究者还注意到,京津之间也存在差异,以及由此差异引起的城市近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对京津沪管理卫生的不同模式,我们无法以统一标准判定孰优孰劣,它们各自适应本地情势而存在。

1. 北洋

就区域来讲,北洋以天津为中心,包括直隶、东北、山东诸省。李鸿章时代通过兴办工业为北洋势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新政则为其提供了作为地方力量崛起的契机,“庚子以还,举行新政,废科举,设学校,裁绿营,编陆军,祛浮文,竞实业,而粲然大备矣。而要以北洋为特出,直隶号称首善,举凡新政,莫

① 孙燕京:《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② 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③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收录入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4页。

④ 《大公报出版弁言》,(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

⑤ 《中医浣俗辨惑集》,《竹园丛话》第12集,“卫生”,天津敬慎医室1925年刊,第114页;光绪三十一年丁子良旧稿。

⑥ 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10辑。

不有开必先”。^① 北洋凭借其新政先行优势，一度保持了公共卫生行政的独特性，并将防疫由天津地方行政推进到北洋区域行政阶段。

2. 北京

“京师虽为首善之区，而民间风气究未大开”^②，其城市近代化历程民族性、政治性明显。作为都城，政治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北京对其他城市的示范作用，“京师号称首善，尤为四方所和会，万国所观瞻者也”。^③ 作为国家官制改革的试点，借助中央力量将其管理模式向各地推广，考察北京的相关情况可以抓住国家公共卫生行政演进的线索。当然，首善之区也背负着时人的期待和责难，“就按着北京说，称作首善之地，无论什么新政先得由京城起个先儿”，^④ “夫以京城四十里而不能，而日望二十二行省之教育普及，非唯奢愿难偿，抑将何以自解”？^⑤

3. 天津

清末天津卫生局是我国专门卫生行政的起点，曾对我国近代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方向起过昭示作用。当时天津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与上海不相上下，但作为畿辅城市，比上海多些保守传统文化的努力，作为商埠，又比北京开通，接受新事物较快，绅商力量也相对为强。天津成为传统力量与近代力量两强并行交汇之地，文化以“杂”为特征^⑥，城市生活处于不土不洋不新不旧的状态。

本书作为地域史研究，笔者本来雄心勃勃地要寻出京津公共卫生行政近代变迁的特点，但在写作过程中，却不得不谨慎了，因为不断发掘出的地方资料使得原有的整体性认识变得不可靠，只有将过渡时代各地的声音辨别清楚，我们才能勾勒出清末公共卫生行政的全貌，才能明确京津的特点。目前笔者所做的工作，是尽量把天津、北京的相关情况写清楚。

（三）研究内容

公共卫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是，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公共卫生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本书在探讨公共卫生机制演进情况时，尽可能做到从时人的认识出发。

① 《直隶之特色》，《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七，“悬赠征文”。

② 《论自来水公司宜整理》，《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八，“论说”。

③ 《内城巡警总厅〈市政公益会规约并启〉》，《中华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十，“专件”。

④ 《办警察先得地方自治》，（北京）《京话日报》530号，光绪三十二年正月，“演说”。因装订原因该报引文具体日期俱不详。

⑤ 梁济著，梁焕鼎、梁焕鼎编：《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10页。

⑥ 王兆祥：《北京——天津城市文化比较》，《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余新忠老师对近世卫生概念及观念的演变轨迹进行过梳理,但主要侧重环境卫生。^① 公共卫生有不同层次,按主体范围可划分为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社会卫生和国家卫生,后两者属于公共卫生范围,公共卫生不是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的简单叠加,其空间上的意味明显,强调社会共有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如街道、戏园、澡堂之于身体和住宅。在内容上,公共卫生的早期实践是以公共场所的清洁为主,且将其视作平时防疫。在意识到公共卫生与近代文明直接关联后,其目的逐渐向塑造国人文明形象转变。

公共卫生行政内容包括医药、清洁、防疫三方面,不同城市由于具体情势差异,在这三方面各有侧重,且程度不一。比如清末天津的医药管理没能发展起来,北京却已将考试医生、规范制药向制度化推进。天津卫生局的防疫设置完备而专业,北京却多处于临时状态,等等。

公共卫生机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机制”为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② 本书所探讨的公共卫生机制包括制度建设(机构、规章)、人员配套(医生、巡警)和思想基础(行政建制原则、卫生防疫观念)等不同层次,以医药、卫生(清洁)和防疫为主要内容,是上述诸方面诸层次相互作用的完整系统。

公共卫生行政模式:杜丽红从近代行政原则出发,将清末依附于巡警体系的卫生管理方式定位为巡警行政。^③ 按此标准,以医生为主体的天津卫生局则是清末中国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不过时人对二者并无明确区分,相对于卫生自治和防疫自治,一概视为卫生行政。甚至在地方自治政治化趋势下,卫生防疫的自治也被称为卫生行政。本书着意于区分卫生管理的不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展示时人对卫生行政的认知情况。

二 本书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思路

(一) 前辈的努力

1. 作为公共卫生史的研究

① 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六十四卷第三号(2005年12月); Yu Xinzhong, *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 即刊于美国出版的有关“卫生史”的论文集中。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8页。

③ 杜丽红:《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8月)。

有关清末公共卫生机制的地域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对京津的相关成果很少,这意味着笔者面对的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广袤土地。

由于资料的限制,京师医科大学堂、北洋军医学堂和北洋医学堂之外的医科学校,天津医药研究会之外的研究团体,众多活跃在社会生活及公共卫生行政领域的医生群体,以及京津医药行政的具体开展情况都还未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①

有关卫生行政的研究相对较多。罗芙芸(Ruth Rogaski)的著作是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典范,1996年她利用天津档案资料完成的博士论文*From Protecting the Body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从卫生到爱国:公共卫生在天津的诞生(1859—1953)》),荣获费正清奖、莱文森奖、美国女学者学术成就奖三项殊荣。以此为基础2004年出版了*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卫生的现代化: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在该书中,罗芙芸着重探讨了近代公共卫生观念是如何引入天津,卫生近代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是如何相互协调的。^②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其对公共卫生相关事务的具体情形着力不多,为笔者的研究留下空间。该书中“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一章站在较高的理论高度,专门对卫生行政近代性进行了反思。^③2006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城市·空间·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罗芙芸又报告了*Water Flows and Human Connections: The Impact of Urban Hygiene on Urban Community*(《水与人际关系:城市卫生对城市社会的影响》),就水源卫生对天津城市

① 对笔者本书启发较大的几篇文章是,罗志田的《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该文对近代中医群体边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仅江绍原的《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中有所介绍,但语焉不详。户部健的「清末における社会教育と地域社会——天津における「衛生」の教育をとして」,〔「中国研究月报」688号〕及《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从社会教育角度对天津医药研究会作了探讨,但未曾注意该会内部分化情况。何任的《解放前的中医学术团体》(《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第23卷第2期(1999年4月))未提及京津的研究团体。薛益明的《医学考核史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13卷第1期(1997年)]探讨的是宋元的考核制度;单藕绮的《我国医师管理法规概述》[《中国医院管理》第15卷第10期(1995年10月)]对清末考试医生情况着墨不多。

②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the Body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Levine, Philippa. 1996.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③ 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做了具体分析。

陈克《19世纪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对传统时期天津官方和民间的城市管理情况进行了梳理。^① 吉泽诚一郎《光绪末年天津巡警的创设和城市行政的变化》一文，跳出制度史研究框架，着重分析了巡警行政在天津城市变迁中的地位，以及对原有行政管理的影响。^② 张利民《清末北京、天津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之初立与比较》通过考察清末京津城市管理机制的发展情况，透视两城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关性和差异。^③ 刘海岩《天津租界和老城区：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互动》对开埠后至20世纪初天津城区、租界各自的市政管理及互动情况进行了梳理。由于租界资料相对较少，笔者本书未着力于二者的比较，详情请参阅刘海岩的相关著作。^④ 宋美云《论城市公共管理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对天津商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为进行了考察，天津商会对卫生防疫的贡献则在其所著《天津近代商会》中有所描述。^⑤ 另外，公共卫生问题在京津城市近代化研究著述中也有所提及，但多语焉不详。^⑥

天津方志办曾辑录《天津卫生史料》，对编写天津卫生史搜集、整理、核实资料起了很大作用。但《天津通志·卫生志》由于资料性质的限制，有关晚清天津卫生局演变的情况存在疏漏和失误。北京卫生史志性著作较多，如《北京卫生大事记》、《北京卫生史料（中医篇）》、《北京卫生志》、《北京志·卫生

-
- ① 陈克：《19世纪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 ② [日] 吉泽诚一郎著，张利民译：《光绪末年天津巡警的创设和城市行政的变化》，《城市史研究》第10辑。
 - ③ 张利民：《清末北京、天津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之初立与比较》，《城市史研究》第21辑。
 - ④ 刘海岩：《天津租界和老城区：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互动》，《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另有与尚克强合著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论文《租界、社会变革与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演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清末民初天津水供给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等。
 - ⑤ 宋美云：《论城市公共管理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天津近代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 ⑥ 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标志着天津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方志研究向科学的城市史研究的转变；《百年中国看天津 引领近代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重新定位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乔红《天津城市建设志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梳理了天津城的演变历程。另外，张利民的《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刘海岩的《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杨大辛《天津的九国租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对天津卫生管理情况有所涉及。

志》、《北京志·市政卷·环境卫生志》，但性质所限，多缺乏深入分析。^①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从公共空间的变化展现北京城近代演进的历程。^②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看法和基本逻辑。^③ 饭岛涉关注了中国尤其是北京卫生行政的“政治化”特征。^④

国内学界论文成果相对较多，且逐步由纯制度的考察转变为制度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不过这些研究多以档案为基础，对临时性和实验性机构、新旧制度的交叉情况、旧机构的新职能定位较少涉及，对北京卫生行政的特点及意义多未加以阐发。^⑤

综合性研究中港台学者的文章给笔者以理念上的启发，梁其姿和邱仲麟明清

①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卫生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编辑：《北京卫生大事记》，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年版；李广钧：《北京卫生史料（中医篇）》，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王康久主编：《北京卫生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版；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市政卷·环境卫生志》，北京出版社 2002 版；张明义主编：《北京志·卫生志》，北京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日] 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研文出版社 2000 年版）。另有《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之考察——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卫生”》（《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 年版），利用档案资料梳理了北京卫生行政建立历程。《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与检疫》（《历史学研究》第 704 号，1997）对城市卫生机构在防疫过程中获得区域组织的合法性进行了探讨。（《作为历史线索的传染病》）（《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缕析。

⑤ 王玉辛《清末的中央卫生机构和京城官医院》（《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3 期（1994 年））以档案资料为主；吴建雍《清代北京外城管理制度》（《城市史研究》第 21 辑）对清代北京外城五城察院所进行的城市管理情况进行了介绍；张文武《超负荷下的蹒跚步履——谈谈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北京警察机构》（《北京档案》1996 年第 11 期）对巡警行政城市管理专业性不足问题加以考察；曹丽娟《试论清末卫生行政机构》（《中华医史杂志》2001 年第 2 期）、朱建平、曹丽娟《清末政府应对疾病的新举措》（《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侧重对中央防疫行政制度的考察；于小川《近代北京公立市场的形成与变容过程》[《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2 月）] 对清末北京生活市场的建立做了建筑史上的考察；杜丽红《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对北京巡警系统管理卫生的性质和行为进行了分析。

时期的相关研究对本文梳理医理及公共卫生演进的内在脉络有很大帮助。^① 余新忠老师近年的研究向医疗社会文化史和卫生史转向^②，其在课堂上的讲授对笔者本书有引领作用。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医学专业的视角开阔了笔者的思路。^③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对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的疫情及应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④ 胡成关于宣统鼠疫防御中的殖民特点及近代华人不卫生形象论述视角新颖。^⑤ 阅读前辈的研究成果如良师亲授，获益匪浅，也促使我努力写出属于京津的东西。

2. 作为近代史的研究

李细珠对近五年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了中肯的评述，指出研究趋向从宏观论争转到微观实证，研究领域从革命史转向改革史，研究视角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兴起。^⑥ 本文尽力跟进近代史研究步伐，利用

-
- ① 梁其姿先生《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版）对国人接受新事物的历程做了探析；《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梳理了污秽致疫在中医内部的发展脉络；《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对当前医疗社会史研究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审视。邱仲麟所进行的明清北京卫生管理研究对笔者梳理北京卫生行政机制的内在演变脉络有很大帮助，相关论作有：《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6）、《明代北京的地理形势、气候与都市环境管理——一个人文角度的观察》，《史原》18（1991.6）、《风尘、街坏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清华学报》新34（2004.6）、《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布、知识传播与疫苗生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3（2006）等。
- ② 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社会及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个案形式对有清一代大疫的应对机制进行了考察。「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即刊于美国出版的有关“卫生史”的论文集中）对卫生概念的演变、粪秽处理方式的变动进行了梳理。《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对卫生行政的近代性作了反思。
- ③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④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 ⑤ 胡成：《鼠疫流行期间的主权之争——以东北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10—1911.4》，《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天津，2006年8月）；《“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网文）等等。
- ⑥ 李细珠：《近五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0期。